

**Tilburg University**

## **Reconstructing Values in Times of Radical Pluralism [in Chinese]**

Jonkers, Peter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Publication date:*

2015

*Document Version*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Link to publication in Tilburg University Research Portal](#)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Jonkers, P. (2015). Reconstructing Values in Times of Radical Pluralism [in Chinese]. *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3), 37-42.

###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 激进多元主义时代价值观的重建

Peter Jonkers 原著, 刘 勇 译

(蒂尔堡大学 哲学学院, 荷兰 蒂尔堡 90153)

**摘 要:** 自苏格拉底开始, 哲学被定义为“爱智慧”。通过这种定义, 把哲学和生活世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然而, 随着现代性的开始, 哲学被定义为“爱”的科学知识, 并且智慧是科学的最高成就, 由此哲学和生活世界失去了联系。罗蒂和马夸德试图通过语言学的方式重新将哲学和生活世界联结起来, 但是他们的努力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 只有透过对智慧的开放性批判审视, 才有可能将哲学和生活世界重新联结起来。

**关键词:** 激进多元主义; 价值观; 价值观重建; 价值观论证; 价值观冲突

**中图分类号:** B82;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5)03-0037-06

在我看来, 当代伦理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是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西方世界, 认为传统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偶然的社会建构。从20世纪60年代起至今, 个性化的进程和全球化在西方已经变成在价值观领域的“去传统化”: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多种复杂的价值传统重整为新的高度个性化的建构, “建构”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因此, 人们认为所声称的价值传统的真理合法性对他们各自团体的追随者是完全无效的, 或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有局限性的。

自相矛盾的是, 尽管大家都认为所有重要的价值观只是偶然的社会建构, 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深深地依赖其中的一些信仰, 尤其是那些属于他们自身生活世界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被理解的价值观偶然性和对人们的深深依赖的组合定义了现有的状况, 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因此, 尽管我完全赞成讨论价值观重建, 但如果这会导致我们

证实每种文化都享有各自的价值, 这会让我们失望。因为说到底, 他们只不过是社会建构。这样的态度会暗示价值传统有权在他们自己的权限内撤销, 因此阻碍了互动、互相理解和互相丰富的机会。

在本文中, 我将对价值观只不过是偶然的社会建构这一论题作一个批判性的讨论。为此, 我将审视价值观和现存观点中的价值传统, 这意味着我会将之视为人类尊严观念的具体化, 并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中进行实现。我探讨的主要问题, 也是构成全球化时代道德价值观重构的基础: 是什么让价值观有价值? 首先, 我将对价值观只不过是社会建构这一流行的观念进行哲学分析; 其次, 我将引用这一观念并进行辩论, 即使人们认为价值观包含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有价值的; 最后, 我将讨论价值观重建的具体方案。

收稿日期: 2014-11-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4AZD005)

作者简介: Peter Jonkers (1954-), 男, 荷兰人, 哲学博士, 荷兰蒂尔堡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文化、历史和西方哲学研究。本文由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勇副教授翻译。

## 一、作为偶然社会建构的价值观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提出为何价值观被广泛认为是偶然的以及在实用性上如何处理价值观所使用的语言。换言之，价值观的合理性，撇开其真相不谈，并不能超越特定的文化限制，明确地说，即当地文化。因此，因为缺少一个共同中性的元词汇，人们将不能衡量所谓的价值观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分析。他认为，哲学上对于真理包括价值观的真相的探求，明显没有任何结果，他们希望价值观的客观真理可以在所谓的自然法则中找到，说明价值观反映了自然秩序，这已经被证实是无效的。相反，所有的价值观和支持他们的描述只不过是偶然的“最终词汇”。他们的真理只能被循环论证所证明，而他们的力量不足以超越个人或团体同价值文化之间斗争的真相。西方人很重要的价值观，可能对于其他文化的人来说无足轻重，反之亦然。这也解释了为何不同价值传统的人之间的讨论常常会产生误解或者导致带有敌意的沉默，而不是双方的互动和互相充实。<sup>[1]</sup>

在全球化时代，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带有价值传统分歧的对抗，通常导致人们用一个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有这些“最终词汇”：讽刺家“几乎从来不严肃地对待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知道描述他们自己的词汇一直在变化，一直都知道他们的最终词汇（以及他们自身）的偶然性和脆弱性”<sup>[2]</sup>。他们不再参照任何标准的永恒样本，比如上帝、理由、真理、自然法则等，试图用新途径持续重复描述自己、社会和这个世界持续再创造自身。因此，讽刺家放弃了在不同价值文化之间任何合理的讨论，因为这是浪费时间。然而，根据罗蒂的理论，讽刺家是一个有病的人物，因为他一直在怀疑是否没有“错误”的语言游戏中被抬高，并倾向于为了考虑他人而放弃他的词汇。因为所有的词汇同样都是偶然的，这样的寻找没有尽头，于是没有一个讽刺家得到安宁。因此，讽刺家冒着不再属于任何事物的风险，完全失去了他的身份。只有在他投入到他所熟悉的词汇中，他才能避开这一风险。因此，他只是简单说明他能严肃对待的是有限制的。总而言之，我们完全有权利在情感上依赖于特定的价值传统，尽管我们在理性上知道这是完全偶然的。

在我看来，罗蒂的分析在许多西方国家正在发生的价值观及其所谓的真理是具有典型性的。他解释为什么人们害怕失去他们所依赖的价值观，特别是在和多个其他看起来同样具有吸引力的以及同样偶然的价值观起冲突的时候。为了处理激进的价值多元化这一令人不安的后果，他们不假思索地断言他们最熟悉的价值观并不是基于合理的基础，而是基于情感的基础。

在题为《巧合的道歉》的文章中，德国哲学家奥多·马夸德对目前西方世界激进的多元价值观提出了一个类似的分析，他表明在人的有限性面前，想要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证实所谓的传统价值观，以及试图在多元化的背景下达成共识已经失败了。这导致对所谓的所有价值观的真理以及确信所有价值观是可以被重新评估的这一论点产生了广泛的怀疑（尼采），所有一切不可能（从无压迫性的话语中达成的共识）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所有一切可能因此是邪恶的（包括对我们所有行为的处置的取向）。因此在被（绝对的话语）共同证明这是善良的之前，这也应被当做是真正邪恶的。只要不是在这个情况下，所有被传统所引导的行为，必须终止并且甚至应被认为是可疑的。<sup>[3]</sup>

此策略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年轻人对 20 世纪 60~70 年代间关于什么是全新的、公正的社会基本法则所进行的无休止的讨论。在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无压迫社会的渴望下，他们开始拒绝所有传统和传统的价值观，因为它们没有被合理的证实，因此是压迫性的。他们确信，通过非压迫性的话语中得到的共识，他们可以建立起一个达到合理理由标准的新社会的基础。同时，他们期待实际生活的这一富足的社会可以使他们避开真实的生活，只要他们关于这一全新的理性社会的本末还没有达到所期待的框架共识。实际上，这一对传统价值观的有组织怀疑导致了这样的一种哲学：它拒绝已经既定的、已经世代传承下的，比如传统价值观，因为它们偶然性的。最终导致只要没有被合理的证实，它就拒绝所有的传统价值观。只要一个特定的、偶然的生活方式没有证实其自身是被合理证实的，最好的选择就是直接限制这一生活方式。当然，这一结论是荒谬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在人生结束之前就禁止开始生活。

马夸德对在多元社会跨越价值观冲突达到合理的共识这一观念的批判有可能导致了这样的观点，即：这一方法利用了合理性和人类社会的抽象观点，这一方法假设人类是智能生物，能自由地在中立的空间里漂浮，而新的价值观能从无到有地发展，只接受通过理性基础或合理化测试的东西。这样一来，它使得人类理性总是产生于具体生活这一事实抽象化了。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在回答在全球化时代如何重塑价值观这一问题上陷入了一个僵局。现代社会的完美哲学，致力于通过自然法则或共识来达到这些价值观的合理性真理，已经被证实是可望不可及的。人生短暂，等不到排除价值观真理的所有疑虑后作出确切性的答案。对这一完整的理性和真理的完美追求导致了对人死后人生的哲学，因此人在死亡之前至关重要问题遗留未解。只有在这样反思的帮助下，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特定的价值观需要重建，而另一些则有理由被废弃。

马夸德的立场和罗蒂对于这一僵局的解决方案类似：尽管传统是随意的，而我们的生活却不能缺少它们。但是对于为什么讽刺家从一个词汇跳到另一个词汇的实践使他疯狂，马夸德的解释远比罗蒂更妙。他将传统表达称之为注定的偶然性，并将之与主观的偶然性区分开来。主观偶然性是一种可以被描述为一些可以/可能被我们所改变的（如：在三明治中间是夹芝士还是火腿）。罗蒂具有讽刺意味的“传统跳跃者”就是这一主观偶然性的一个明证。马夸德认为能任意重新描写人生和生活世界，而在另一方面，注定的偶然性主宰了人生，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自然和历史的特殊性的力量。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制定计划或作出决策时的自大和自以为是通常使我们看起来很可笑。大部分的传统价值观，就像所有其他的最终词汇一样，明显是属于注定偶然性，因为它们决定我们远超于我们决定它们。我们人类更是自身注定的偶然性，而不是我们自身的选择。总之，在马夸德看来，尽管传统价值观是随意的，但没有理由不重视它们。与之相反，没有了它们，人将无法生存。

## 二、对于偶然性传统深深依赖的悖论

在前一部分中，我已经表明，当代众多哲学家明确承认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不论是因为我

们认真对待的传统价值观有其局限性（罗蒂），还是因为它们就是我们人类自身的一部分（马夸德），但是这种明确对价值观依赖的宣告并不能阻止它们的随意性。这一随意性不仅关乎我们对这些传统价值观所依赖的个人、历史和文化背景，同样也关乎价值观本身的内容。因此，据这些论者所说，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某一深度依赖对其真相而言没有任何含义。它只被心理和文化因素所决定，因此只是时间和地点的问题。这意味着倘若宣告其真实性有意义的话，此宣告只限于在已经从事这一生活（宗教）方式并因此确定其真实性的人中间起作用。不论对已经转化的人来澄清和冥想这些真相有多重要，但并没有普遍被接受的合理性的观念或中立的元词汇，能被用来充当司法权威（用康德著名的表述来说）来衡量所谓的不同价值观的真相。因此，人类似乎从本质上致力于既定的传统，致力于他们只是偶然所属的且同样自身也是偶然的价值观。这一结果给本文留下了一个未尽的主题，即如何在激进的多元化时代重建价值观，特别是这一重建的目的不仅仅只是确认传统价值观是一种社会结构。

在分析了在激进的多元化时代价值观重建的一些潜在问题之后，我将试着本文的剩余部分对此问题给出一个正面的答复。应该看到，我们经常体会到我们许多的深深依赖里都包含了偶然的因素。我们的日常习惯，从我们喜欢的食物品种到我们的晨祈晚祷都属于这一范畴。我们通常不自觉的执行这一些行为，而只有在我们有时不得不放弃这些行为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对此行为的深深依赖的特点。在我们看待我们对母语（native language）的依赖时，我们这些深深依赖的偶然性内容更加清晰。因为“Native”这个词已经表明，这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语言，在此意义上，这使我们可以表达并分享我们最深厚的思想和感情。在我们出国并且想与他人进一步沟通，不仅仅是分享普通的“机场信息”时，我们对此深深地依赖深有体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感到有些妨碍，因为我们经常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感情，或者理解不了我们对话的另一方的确切含义和言外之意。然而，我们的母语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因为这取决于我们父母所说语言的偶然性，这是一种母语。因此，没有人真正想要主张这一真相。尽管我们在

实质上依赖我们的母语，这一点也不意味着与其他语言相比，我们的母语更为正确或更高级。与之相反，所有试图提高我们重要的深深依赖的尝试都会压迫到其他有着不同深深依赖的人。尤其在 globalization 时代，认识到我们的许多依赖是偶然的对于我们与他人和平共处至关重要。

在反思我们的深度依赖时，大多数人意识到这些依赖大部分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随意性因素，因此，没有人想要真正了解这些真相。尽管我们以一种实质性的方式依赖我们的母语，但这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们的母语与其他语言相比更为“真实”或更高级。相反，所有以这样的方式试图提升我们深度依赖的行为都会导致对拥有其他深度依赖的人的压迫。海德格尔深信德语是在古希腊语之后用来谈论哲学最好的语言，这正好表明了他对其母语依赖问题的特性，特别是看待他在纳粹时代的政治立场时，同时这是对非德国哲学家的侮辱。这也同样适用于古希腊人，他们通过称外国人为野蛮人来强调他们“语言优势”，从而取消这些外国人所说的语言资格。这些例子清楚的表明认识到我们深度依赖的目标是一种偶然性是多么重要，并必须一直保持如此。这能阻止我们将之强加于他人，因为这意味着对他者或文化完整性的非法侵犯。特别是在 globalization 时代，和平相处的关键就是能够意识到我们许多依赖的随意性。

问题是这一论证是否对所有重要的价值观和价值传统而言都是正确的。它们是否和我们的日常习惯和母语一样具有偶然性，是否意味着谈论其正确性是毫无意义的？是否人们在表达他们所依赖的价值观真相时，仅仅是在表达他们自身的或他们恰巧所属的团体的情感？相比之下，是否他们所说的这些价值观是正确的？若是如此，那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又是否合理？或者他们是否会因为压迫和专制变得有罪？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将特定价值观强加给其他人民的悲剧，尤其是在殖民地化时代。

尽管没有人真正愿意回到 20 世纪的文化殖民主义时代，价值观的偶发性和真理的斗争一直是或者重新变得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在全球化时代价值观重建的核心问题。为了重建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决定哪一种价值观是真正或真实有价值的。只有那些超越了个人领域或文化偶然性，并

且值得在公共领域为之辩护的价值观才是。

为了说明这一重要观点，我想就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冲突给出一个具体例子，从一个欧洲人的立场上来看对价值传统的深深依赖，归结起来就是尊重人的身体和精神完整性的不可侵犯，或者更一般来说，人的尊严<sup>[4]</sup>。虽然此价值传统的起源和内容以及我们对此的承诺都包含了许多偶然性因素，但是，当与拒绝甚至攻击这一价值观的人起冲突的时候，许多欧洲人觉得不仅是价值观的重要因素，连一些基本的内容都是正确的，并因此值得公开为之辩护。他们并不觉得这些欧洲人的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和许多最终词汇一样，而是觉得这是对什么是真正的人和什么应该是正义的社会的解读。尽管历史表明这些价值传统的起源是偶然的，尽管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需要持续的完善和适应，但这绝对不是人与人之间或国家和其国民之间关系真正应有的一种表达。很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能够合法宣称他们的价值观是人类尊严的普遍标准，其他价值传统特别是非西方的价值观，可能也包含了可以突出人类尊严的其他方面。但是既然这样，非西方人同样也认为他们的价值观超越了历史和社会建构的偶然性。

在价值观的背景下，我们使用诸如“正确的”和“通用的”来表达一些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些对于表达这些价值观的个人或者志同道合的小团体来说不仅仅是正确的内容。为了使这一观点更具体化，我们与他人公共领域交流我们实质性的承认，要求他人认同这些观点是一些不可或缺的表述。换言之，我们要求他们认可这些用来巩固这些承认的价值观是我们生活真实的方向。寻求认可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必须在他们的人生方向中采用我们的价值观，或甚至我们总是能与他们达成共识。这可能会是人们生活传播中不可避免的否认，因此也是对我们重要承认的真正分歧的否认，因为他们是根植于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类具体存在的偶然性。期望这个重要承认的真正分歧可以最终被所有价值传统之间的和平对话所取代，并达成一种世界精神，这是一个幻想。与之相反，寻求不同价值传统真理的认同经常表现为一种痛苦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但是无论如何，寻求认同的过程表明有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危在旦夕：其他人要求我们认可他们的价值传统的

重要承认是一种尝试表达一些重要的事物并和我们自身的重要承认有着相同的价值,尽管我们可能不共享他们的承认并且对他们充满排斥。认可的过程可能只发生在有重要价值观冲突的背景下,因为只有在那时,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参与者才会意识到有些重要的事情危在旦夕。因此,当其他人不认真对待这些意义,我们会感到非常沮丧,会将这些意义减少为偶然的个人观念,他们的认可不取决于他们的实质,而仅仅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性格,取决于他们不会引起太多麻烦。

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实际的认可过程及其社会和政治含义,而是在寻求认可时,我们朝着必要的超越我们主观的自我存在主义的真理迈进这一事实。最终,我们不想被留下独自面对我们偶然的信仰和实践,或也没有准备将他人独自留下面对他们偶然的信仰和实践。我们不能接受我们个人的对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依赖在公共领域是完全偶然的这一观点。

### 三、价值观论证

前人对于价值观的真相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如前所述,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在全球化时代重建价值观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条件。首先,越来越容易看出传统价值观所宣称的真相同科学与理论哲学所宣称的真理是不一致的。为了合理地讨论价值观的真正价值或价值观的真相,哲学必须从以这些价值观为生的人民生活开始,并接受价值传统是实践智慧的表达,并需要经过相应的考察。在价值观和其他实践智慧中,重建价值观首先所需要的是特定价值传统的诠释学。

诠释学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文化上的价值观论证。此方法来源于各个宗教间的对话传统,也即在经文辩读的名义下,致力于解读宗教信仰和习俗<sup>[5]</sup>。首先,所有参与文化价值观论证的各方必须认同他人价值观中他们认为的神圣性(无需认同这一角色对其自身的权威),同样也认可他们并非唯一“拥有”他们文化传统的价值观,也就是他们并非是对此终极含义的唯一专家。通过这一方法,文化价值观论证致力于促进参与此对话的人们自我反省的态度,而无要求他们放弃他们价值观中他们认为的神圣性。

文化价值观论证起始于认可价值传统是对于美好人生的一长串的论证的结果。所以,价值观

论证避免了使这些价值观缩减为偶然的社会建构。为了表明这些价值传统所声称的真理是合理的,他们必须将之公布于众,这样他们才被其他传统的人所理解。价值观论证通过将美好人生的观点,对哲学论证的解释和公共事件的问题汇集在一起而完成了这一任务。换言之,价值观论证使文化传统变得自省,特别是其成员必须认可他人价值观的神圣,而无需认可对其自身的权威。当人们进入公开辩论的诠释学循环,并且通过辩论自省,他们学会了接受他人所表达的价值观传达了一种可以在哲学上被解读的智慧,并因此给所有公开辩论的参与者提供了精神食粮,即使他们不分享甚至拒绝这些价值观。因此,根植于价值传统的智慧的哲学解读给不同的文化创造了一个共享的领域。但是,鉴于传统价值的异质性,价值观论证是有许多声音的,也即意味着目的并不是为了达成共识。它甚至可以缩减为单一价值观体系独裁式的独白,扭曲了所有其它价值观。

以上表明,价值观论证在不同传统之间调停。它通过开展公开的深入的价值观论证,以便他人可以学会理解并发现为什么这些价值观会进行特定的论证,而不是特定的假设或偶然的社会结构,并且它们为何是有吸引力的或有问题的来达到这一目的。换言之,价值观推理刺激传统价值观进行自我反思,他们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可以被不属于这一特定传统的人所接受,而无要求他们接受任何专属认可的要求。

因此,价值观论证能够在他们自身的权利下理解价值观是文化的基础。它致力于建立一个由多种价值传统共享的自我反思和诠释的领域。此共享领域是对存在主义定位共同需要的结果,是所有价值传统都试图向它回应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到共享领域(所有价值观致力于公开不同价值观系统论证)在追求共识上并不是相同的同样重要。而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是友谊,也即每种价值观的神圣性认同和想要共同研究它们的渴望。

那么,如何才能让价值观论证实实现基本价值观的神圣性认同,并避免这种认同变成唯一呢?答案是只有在不同价值传统成员之间没有要求特定的文化承认和特定的人权解读,开展协调讨论时,这样的讨论通常变成一个西方个人主义的讨论。价值观论证的参与者只是一种特定价值传统



的成员。但是通过这样做,他们认识到他们特定价值体系并没有穷尽所有人类自尊的观点,这也是每种价值体系的基础。因为这一认可对所有特定价值体系都很重要,没有任何一种可以宣称他们是垄断的。而且,价值观论证预备了一块共享的场地,意味着有价值传统的成员接受其他人也属于这里,而无需详细说明他们的论证本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论证的目标是友谊,友谊来自于尊重各自的学习传统,而不是对于某一特定问题达成共识。为什么价值观论证可以在激烈的文化差异背景下对价值观冲突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最终原因是因为它不会在论证和叙事中产生强烈的差异。因为价值观论证将价值观解读、哲学实践和理论论证以及公共事件问题汇集在一处,在每一阶段都有讨论。这也再一次因为价值观论证是实践性智慧的一种表达,是在一个共享而非中立的场地所进行的实践。换言之,通过其在智慧的源头,价值观论证展示了一种比现代程序理性更广泛范

围的合理性,并因此能够包含论证和叙事。

#### 参考文献:

- [1]Richard Rorty.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Language and Arguments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42.
- [2]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Solidar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3.
- [3]O. Marquard. Apologie des Zufälligen. 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en zum Menschen[M]. Stuttgart: Reclam Press, 2003:151.
- [4]Hans Joas. Die Sakralität der Person [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Press, 2012.
- [5]Staf Helleman and Peter Jonkers. A Catholic Minority Church in a World of Seekers [M]. Washington: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Press, 2015.

## Reconstructing Values in Times of Radical Pluralism

Written by Peter Jonkers, Translated by Liu Yong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Tilburg University, Tilburg 90153, Netherlands)

**Abstract:** Ever since Socrates, philosophy has been defined as the “love for wisdom.” By doing so, he pursued the tradition of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the life world.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ty, philosophy has redefined itself as (the love for)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considered wisdom as the supreme fruit of science. The result of this paradigm shift was that philosophy lost its link with the life world. Rorty and Marquard tried to re-connect philosophy with the life world in a pragmatic wa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oday’s radical pluralism of life worlds, they abandon, on a theoretical level, Socrates’ ideal of a reasonable, philosophical scrutiny of the life world, and, on a practical level, welcome (ethnocentric) conformism or traditionalism. Because these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to the life world are not isolated, but reflect important tren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respond to the enormous challenges that humankind is confronted with, especially on a global level. The overall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philosophy, by re-connecting with the life world through the idea of wisdom, can shed a new light on the ways in which the life world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ublic debate about the enormous challenges that contemporary pluralist society is confronted with.

**Key words:** radical pluralism; values; value reconstructing; value verification; value conflict

(责任编辑 丛 琮)